



ZHUDONGRUN
ZIZHUAN

朱东润 著

朱东润自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ZHUDONGRUN
ZIZHUAN

朱东润自传

朱东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东润自传/朱东润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6613-1

I.朱… II.朱… III.朱东润-自传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2208号

责任编辑:徐文凯

装帧设计:蔡立国(特邀)

责任印制:李博

朱东润自传

朱东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94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6.25 插页2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978-7-02-006613-1 定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这是一本自传，属于传记文学的一个部门。

中国史传文学的发展是很早的。《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叙传》是纪元前后的作品，但是这两篇只是约略叙述了作者的生平，而以更多的文字介绍全书的篇目，因此实际上都还不能算是自传。自传的作品，在国外只是二百年以来的事，在中国还要更迟一些。

自传和其他的作品明显的区别，在于这是一本永远不能完成的作品，因此在整个结构方面，不可能像其他作品那样的完整。这本书以我八十年的人生历程为界，比较地有个全局的概念。纵使在这本书里面，看不到作者的一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本自传都是不可能写得那么完整的。

自传的写作还有一个限制，作品总是从主观出发的。作者叙述自己的生活时，不可能脱离自己而全凭客观。在我们无法立在半空的时候，要求作者做到完全客观地叙述，这是不现实的。是不是可以做到比较客观一些呢？完全应当如此，问题在于作者尽量如此争取以后，读者很可能认为还是不够客观。立场不同，看法必然不能一致，这是无法统一的。

作者是人，和读者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也必然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必然影响他的作品，特别在自传这样的作品中，影响较大。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将来会有这样的人，纯客观地对待自己，祛除任何可能出现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想法是不难的，但是要看到这样的人，我们还必须等待，很可能我们所得到的

结果只是很大的失望。

这本书的写作,起于1976年2月15日,成于同年12月6日,
我的第八十一个生日。

朱东润

1976年12月6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幼年	1
第二章 上海六年	28
第三章 国外三年及其后	59
第四章 广西二年	81
第五章 南通前八年	94
第六章 南京八十日	132
第七章 南通后二年	150
第八章 武汉大学前八年	164
第九章 泰兴一年	220
第十章 武汉大学后四年	230
第十一章 中央大学前四年	263
第十二章 六年流转	314
第十三章 复旦大学(一)	365
第十四章 复旦大学(二)	392
第十五章 复旦大学(三)	489

第一章 幼 年

(1896~1907)

我是1896年12月6日在江苏省泰兴县出生的，^①那时清王朝还统治着中国，用的旧历，是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这一年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的第三年，清王朝的统治久已摇摇欲坠，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亡国的现象更加迫近了。中俄新约、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中德租借胶济条约、中俄租借旅顺大连湾条约、中法租借广州湾条约等陆续签订，至于台湾全省的割给日本，那是甲午战争的直接结果，还不在于其内。瓜分中国的形势已经完成了，但是在我的家乡，对于这个情况还不清楚。

泰兴是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在长江北岸，扬州东南，两千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所以西汉枚乘《七发》说到“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又说“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西汉初年的长江口正在扬州东南，泰兴还位于江中，近年在城东发现大鲨鱼的骨骼，正是绝好的证明。由于江沙淤积，到第十世纪前半期，泰兴县才正式成立。在我出生的时代，据《光绪泰兴县志》，泰兴人口，只有三十万左右，当然是个小县；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万，就不能算小了。

朱姓在什么时代移居泰兴的？据《朱氏宗谱》说，南宋初年左都御史朱宝明看到当时统治者对外屈服，因此跨马渡江，到了泰兴，下马一看，原来是一匹泥马。后来在朱氏宗祠里为这匹马塑

^① 作者误记，实为12月4日。

像,祭祀的日子还得为马上祭。这件事怕不一定可信。第一,宋代没有左都御史这个官名。其次,即使泰兴是一个滨江的县份,沿江还有不少的沙滩,跨马渡江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泥马渡江,和宋代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太相似了,因此必然掺进了不可靠的成分。在这位宝明公之后又有十一官人、十二朝奉这些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人物,不像历史的记载。此外,这部宗谱的首创者一冯公是明末的人物,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中间经历五百年,他凭什么写下这部宗谱?有一点明确的,是在满洲入关以后,泰兴朱姓曾经搞起一支队伍,对于满洲人的统治,进行抵抗,这在《泰兴县志》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里都留下一些记载。

我的直系亲属,最远的我只记得曾祖父松年公,他住在江滨,因为他的耕地之旁,涨出几百亩沙滩,这一下他的情况大大好转,自己也搬到泰兴县城里来了,这就是苏家巷老宅,传到现在,我的侄儿还住在那里。可是长江是无情的,一场大潮,把松年公的沙田冲去了一大半。沙去了是无法挽回的,可是沙田已经升科,田租是轻易不能豁免的,他得从泰兴县到通州,一步步地去吁请,待到田租问题解决以后,他的沙田由于江水冲击和衙门使用,几乎全部报销了。

松年公只有一个儿子,即我的祖父星海公。因为早年境遇还好,他读了书,考过秀才,前前后后考过十次,始终没有考上。祖父还有一项本领,他是一位乳科的专家。家中相传,祖母是因乳痈致死的,这就使得祖父发愤专攻乳科,终于成为有名的专家。他的这门特长,后来传给我的伯父和父亲,伯父有时还为人家治病,父亲是一向不替人看病的。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只看到一些医书和成药,可能是父亲留下的,也可能是祖父留下的。可是由于伯父特别推重自己的弟弟,所以我相信父亲是一定学有专长的。

父亲石庵公兄弟二人,伯父玉山公也是读书的,考秀才好多次,可是也没有考到手。那时秀才只是一个口头的名称,正式的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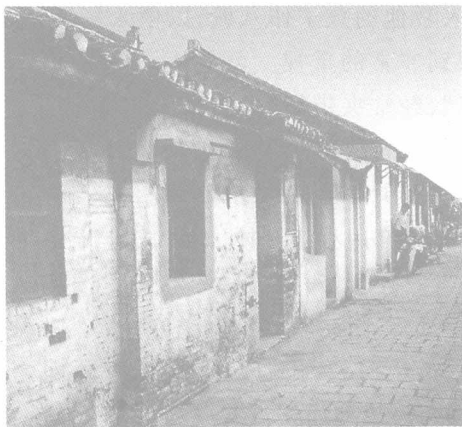
称是县学生,通过这个考试,就算是县校的学生,可以受到教谕、训导——县校教师的官衔——的教育了。考试就是作八股,从《四书》里出题目,作破题、承题、起讲,以下便是八比,最后是一个小结。考试出身的称为正途,从县学生进而为举人、进士,这是一条做官的大道。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还有军功出身的一条路;直到清末,又有捐班出身,那更是鱼龙混杂了,都不及考试出身。严复从英国留学回来,重学八股,背着考篮入场;帝国主义分子赫德掌握了中国海关的全权,还要请人教他的孩子作八股,以便入场考试,都是这一回事。八股确实得到非常的重视。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十分可笑:那时入场考试,经常夹带舞弊,到今天还留下当时流行的不少书籍,密行细字,印刷的精致,远远超过现代书本,那时是一般人都可以置备的。还有些头童齿豁的老师宿儒,把全部《四书》都做成八股文,上千篇的文章都用小字密抄,编订成册,衬在考生常用的马褂里,这件衣服,有时要卖好几百元,考生买了,穿好入场,临时拆开照抄,同样可以考取。因此八股一途说可贵固然非常可贵,说好笑也就非常可笑。话说回来,我的这位伯父,虽在县考里曾经考到一名备取第一,在州考里却始终没有成功。

祖父和伯父一连遭到挫折以后,父亲当然不会考虑再走这条路了,他也知道自己是迟钝的,更不容选择这条道路。由于三姑母出嫁,最后一点点田地也作为妆奁田过了户,自己又结了婚,孩子也有了,总不能坐以待毙,最后下决心改业。恰好他的再从兄弟瑞二伯、长三伯两位正在经营一爿茶叶店,他就去那里担任售货员,从龙井、武彝、毛尖、雀舌这些货品里找出路,这样又经历了若干年。

可是这两位再从兄弟并不是什么经营能手,在倒闭的边缘上挣扎了几个反复以后,终于失败了。在这次失败中,父亲失业了,而且由于小小的县城里容不了几爿茶叶店,自己即使积累了些业务知识,竟然找不到第二个就业的机会。大的孩子总算在一家布

庄当上艺徒,但是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一家大小五口,吃饭就是一个问题,怎么办呢?父亲的心境正在煎熬之中。

就在这年十月的最后一个深夜里,我出世了,那年父亲、母亲都是四十一岁,大哥二十岁,二哥十二岁,三哥十岁。父亲正为家境的艰苦而困惑,大哥在店里,二哥、三哥都熟睡了。一盏昏暗的油灯投下深沉的阴影,产婆把婴孩收拾干净以后,包扎停匀,扔在方砖上给他第一次锻炼。



泰兴县城苏利巷老宅

时间慢吞吞地消失了,曙光反映到这所朝北的小屋里,母亲从分娩的昏沉中苏醒过来,一眼看到躺在方砖上的婴孩,她挣扎着和父亲说:

“兴保爹,把孩子递给我,他在地下躺得太久了。”

兴保是大哥的小名,小地方的夫妇通常是带着孩子的小名相互称呼的。我在地上其实还只有半夜,

由于母亲的慈悯,这才重新获得人间的温暖。当时的风俗是这样的,婴孩初生,要在方砖上躺这么一天一夜,据说为了孩子的健康起见,从小就得给他这样的锻炼。现在的办法完全不同了,不过我想这个办法不是没有道理,我能把我的健康情况作为一个具体的证明。

母亲是慈爱的,但是我的出生并没有在她的心坎上得到同情。她在有了三个男孩以后,总是希望有一个女孩,长大以后,能够在她脚前脚后,干一点零碎活儿,可是偏偏第四个还是男孩,实在意味着希望的破灭。因此我只能凭我那天真无知的小动作博取母亲

的慈悲。

父亲呢，他老是惦记着一家大小的生活。没有田，没有工作，只凭着典当，或是出卖一些还可让出的房屋，那怎样活下去呢？所以在伯父问起可曾给孩子起名的时候，他只是说：

“大哥，你看一家五口，现在是一家六口了，凭什么活下去，这不是完了吗？孩子就叫做‘完了’罢。”

“唉，”伯父说，“这怎行呢？哪能给孩子一世背上这个名字呢？我看我家两个男孩，你家四个，这个孩子就叫做‘六六’吧。”

由于伯父的规诫，我才不致背上“完了”的名称，而要在一生中挣扎向前，争取自己的前途。

事实上父亲正在生存的狭路上，带着我们母子挣扎前进。但是在残酷的旧社会里，他又怎样前进呢？工作吗？没有就业机会。投亲靠友吗？他们也在深渊中挣扎；即使偶然有个别幸运的，也难免不因为剥削成风，带着剥削的利刃迎面而来。剩余的一条路只有靠典卖房产度日。我们的住处已经紧缩到三间四架梁的南屋和两间灶披了，他就把剩余的十多间屋子逐间典出，卖绝。这样总算维持了四五年。

在我四岁的那一年，性子温存的二哥由于营养不足，被肺病夺走了生命。祖父留下的医书，一半送给看病的温锦堂医生。这位老先生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却是饱有医疗经验，对于治病的报酬从来没有计较过。旧社会的黑暗里毕竟还有一线的光明，这一点我们是应当看到的。

次年是一十九世纪最后的一年，也是中国面临着瓜分的命运，帝国主义者不敢竟行瓜分中国的一年，中国人民终于觉醒了。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有所觉悟，1895年，进京会考的一千三百多人，以康有为为首，上书请求变法，历史上称为公车上书。1898年4月，开始变法，称为戊戌维新。一百天以后，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进行宫廷政变，重新回到原来的老

路。帝国主义者——英、法、德、日、美、意、俄、奥——磨刀霍霍而来。这群豺狼们已经瓜分了非洲大陆，现在准备瓜分中国了。统治中国的清统治者虽然没有胆量对付这群豺狼，但是他们决心为虎作伥，把中国献给帝国主义者，舔着刀口上的余血，维持他们那不值一钱的生命。中国人就是这样地心甘情愿地由他们宰割吗？不能！北方的人民醒了，他们竖起“反清灭洋”的大旗，手无寸铁地和洋人搏斗。一个人倒下来，千万个人拥上去，终于把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狂潮顶住了。清政府的跪着求和的无耻行动能挡住他们吗？不能。野兽决不会因为长跪哀求而停止咆哮，唯一能打退他们的是刀枪、是拳头、是热血。庚子的结果是胜利，不是失败，是中国人的觉醒，不仅是四万万两的赔款。诚然，由于清王朝的无耻求和，中国人被残暴的帝国主义者讹诈去大量的赔款，但是赔款只能为帝国主义者准备一个粉身碎骨的泥坑。

经过庚子的大动荡，清王朝看到自己面临着灭亡的命运。他们还想作最后的挣扎，他们想逐步收回到人民手里的政权，也想逐步消除地方分裂的形势，但是已经太晚了，没有用了。以后不到十年，清王朝彻底崩溃了。

这一年，三哥十四岁了，由于母亲的一位堂房弟弟的介绍，到姜堰的一家布店当学徒。从此家中只剩父亲、母亲和我三口人了，但是生活还是很艰苦。除了自己的住房以外，其余的房屋都保不住了。有三间店房本来出卖给张姓的，父亲因为生活艰苦，准备按照泰兴的风俗，再去张家找价的时候，张家甚至喊齐狗腿子，准备给父亲一顿殴打，总算父亲见机撤退，免去一场侮辱。

泰兴的风俗，一般的店家都愿意由顾客赊欠，来往多了，利息也厚了，可是到了端午、中秋，特别是到了年终结账的时候，这便成为一笔巨款。顾客怎样应付呢？当然加紧设法变卖典当，才能偿还这笔累积的债务。到实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只有设法躲避，但求躲到四更以后，便可大摇大摆地出来，即使遇到了凶狠不过的债

主,尽可高举两袖,深深地一揖,口称“恭贺新禧”,债主也只能回答一声“彼此彼此”。父亲是不止一次这样地度过除夕的。

二十世纪的第一年,那时我号称六岁,实足四岁两个月,我开始入学了。其实这还不是学校,当时称为书房。塾师是本家叔叔保三。父亲带我去,我朝着孔夫子的牌位叩了头,然后向保三叔叩头。父亲和保三叔谈了一会,我便留下朗诵“人之初、性本善”了。我的本性并不太恶,可是却也并不喜欢读这个“性本善”。有时还要写字,就是在红格上描写。对于五六岁的孩子,这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一些。所好在初学的时候,保三叔指定一位女同学捉着我的小手描写。这位女同学是杨明珠,家在我家对门,大约比我大六七岁,那时私塾里经常是男女同学,并没有什么分界的。

但是我毕竟不很喜欢上学。我想逃,可是只要被母亲看到,她总是拖着我的辫子,那时中国人不分男女,都是有辫子的。这样拖呀拉呀,要拖过半条巷子,待我看清实在没有机会逃学,这就和母亲说清楚,乖乖地到巷子西头上学了。

父亲每天一早就要出去散步,因此这样的事情都是在父亲外出时发生的。偶然父亲不出去了,这就是我的幸运。我因逃学而被母亲拖住辫子的时候,父亲会出来喊一声:“不用拖了,孩子不准备考状元呀。”这时母亲才肯放手,我便跑到父亲的那六平方米的小间里,趴在柜子上看《三国演义》的画像。“不准备考状元”对于我实在是一种教育,是要我在一般人拼命向上爬的时候,停下一步,这对于我的一生是有重大意义的。

大约经过半年以后,我对于上学逐步地习惯了,不再逃学了;字也会写,用不到把笔了。我记不清楚是不是读过《百家姓》、《千字文》;但是记得读过《龙文鞭影》,那里说:“粗成四字,海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祷雨,汉祖歌风。”读着这样的句子,确是怪有意思的。

八岁那一年,我开始读《四书》了。保三叔一直要我们读熟、背

诵,但是始终不给我们讲解。有时他为一些大学生——年龄大一些的——讲解,我在旁边听讲。大学生回讲不来的时候,我不免要插上三两句,因此在那私塾里引起一些注意。

最苦的是在保三叔出街有事的时候,要我代他维持秩序。这座私塾,虽然不大,学生总有二三十位。除了年龄小的和女生以外,十几岁的总还有七八个。他们见到保三叔一出门,看清楚现在是他们的天下了。口角的、相骂的,这还算是文戏。更多的是武戏,他们使拳弄棒,最后经常以打架而告终。凳子踢翻了,书桌也搞得东倒西歪。这个时候,保三叔回来了,大家来不及整理,只得勉强就位。保三叔一肚皮不高兴,那就要问我这个维持秩序的人是怎样维持的,有时还得狠狠地教育一下。尽管我那时只有八岁,我和父亲说起希望换一个地方读书。

1904年,泰兴果然办起第一所初等小学,那时称为蒙学堂,办在广福寺大殿东首华严境的三进屋子里。现在广福寺全部改造了,成为泰兴县第一招待所,十年前我回去的时候,还看到剩下一所东边的钟鼓楼。蒙学堂招生三班:主持人是王馨堂老师,此外甲、乙、丙三班的教师是金冶卿、李燕贻、张子伟三位老师。开学那天,学生到了,各人拣一个座位坐下。老师们按照事前准备的名单点名。乙班的李老师点到我的时候,丙班的张老师说:“已经在这里了。”我就在丙班上课。那时用的课本是无锡两等小学编印的,老师写在黑板上,孩子们便照抄。第一课是“我生大清国,我为大清民”。几十年以后,我曾和人谈起:“什么人在孩子入学第一天,就要他读这样的课文,真可怪。”

那位无锡人说:“课本是我编写的,主要是为了掩盖清政府的耳目。”我这才知道这原来是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业绩。自从庚子事变以来,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已经肯定了,问题在于是让它带着中国一同灭亡呢,还是由中国抛去清王朝而争取存在。同盟会是决定采取后一条道路的。《老残游记》是一部观点很不正确的小

说,但是作者指出“北拳南革”,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一些线索的。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正是同盟会最活跃的十年,连泰兴这个小小的县份,也掌握在同盟会的手里。那时的知县官龙璋就是同盟会员。尽管他是水晶顶子、蓝翎、墨晶眼镜、马蹄袖,一身老官僚的打扮,但是他是一位革命党,同盟会副会长黄兴就曾在他的衙门里留下脚印。龙璋在任上,办学校,派留学生,也着实做了些革命的启蒙事业。我们这些小学生在哪里读着“我生大清国,我为大清民”,但是也唱着这样的歌曲:

进兮进兮进进进进进,谁谓黄人大梦犹未醒?精神一到何事不可为,化作英魂保障我国民。死兮不退好个壮男儿,为国为家为我众苍生。

这是一首进行曲,已经鼓足了人民的斗志。另外一首歌说:“谁为我首,谁始要盟,吾党何日醒!”这就是要追究庚子事变、辛丑条约的责任,要追究个水落石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在一个九岁孩子的头脑里究竟不能十分清楚。

在蒙学堂里还有一个插曲影响到我以后的生活。

四五月里,泰兴有一次迎神赛会。那时人民还是相信神道的:城隍、关公、东岳、药王、都天、禅师这些不伦不类、乱七八糟的神道要搞一次大集会,还有旗伞执事、吹打锣鼓、平台秋千、拜香凳、烧肉香、踮高跷各式各样的玩意儿。这一天蒙学堂的学生一大半都去看会了,稀稀落落的剩得几位老师和三五十个小孩子。

王老师是主要负责人,看看实在不像样子,他说:“这样吧,甲班照旧上课,乙班丙班并在一处上吧。”这样我就到李老师教室去了。

那时教课的顺序,是抄教材,教师讲授,讲授完毕,孩子们按次排立,由教师逐一问询,对答不上的就排到后边去。以后就照新排的次序就位。一天的功课完毕,每人的座位也就不免有个升降。那天的结果,我是排在第二名。

当天晚上我到家的時候，把情況都向父親說了。父親說：“明天到學堂去，就按照今天的位次坐吧。”

第二天我一進學堂，就坐在乙班的第二位。原來的耿平修不同意，就去稟告李老師。

老師問：“昨天你哪兒去了？”

“去看會了。”

“我沒有答應你去呵。暫時你還是坐在後邊，待今天答問以後重新排定吧。”

從此以後，我坐定在乙班的第二位，第一位是薛汝漢。同班的除了薛、耿以外還有伯父的孩子本君哥，比我大兩歲，坐的位置却不很高。

那時我們已開始作文，後來稱為綴法、寫作或創作，主題卻很不一樣。因為科舉還沒有廢，我們的習題經常出在常讀的《論語》、《孟子》里。文章怎樣作，我全然不理解，有人發現只要抄朱注或是什麼章旨、節旨之類，老師總是滿意的，因此作文課題出過以後，大家就一味抄書，闖過了這道難關。

家里的經濟情況，越發困難了，由於袁森記歇業，大哥遭到解雇，困難更嚴重了。除了自己的住房以外，更沒有什麼可典可賣的，父親只有靠當舖生活了。

當舖是舊社會落後地區的一種盤剝人民的營業場所。泰興城里有三家，鄉間有七八家，他們內部組織非常嚴密，有保卫自己的炮樓、鳥槍，所以實際上是一種武裝組織。一般是徽州人開設的，後來也有一些揚鎮幫參加，不過經常以徽幫為主，裡面經常說徽州話，他們的衣服也和當地人不一樣，因此他們是社會里的一個獨立組織。可是他們也得雇用一位當地的紳士作為名義上的管事人，簡稱外管。泰興的一位退居的翰林公就是這十幾家的外管，他的工資是每家銀圓一百元，每年年初他到各典所供的財神老爺前面磕一個頭，其任務只有在各典出了問題的時候，和知縣官去通通聲

气，给当铺一些好处。因此他的工作称为“磕头饭”。

当铺的内部组织是非常严密的，最上一层称为三大宪：管事、管钱、管楼，而以管事总其成。管钱专管银钱往来，管楼专管堆栈进出。以下是五六位站柜台的，称为头柜、二柜不等，名义上是头柜领班，但是并不一定，因为各人的收入完全是按照所经管的事务提成，所以有时末柜经营得法，他的收入也就超过头柜。除了这些营业员以外，都是学徒。学徒之中资格最老的四位专管开发当票，称为中班。中班所写的字体，像是草书又不一定是草书，是当铺中特有的字体；所用的语言也不一样，例如当进一件皮袍，照例写上“虫蛀”，当进一件农具，照例写上“破损”，这样即使把东西搞坏了，他们会说当票上本来写明；你如说是字迹不清，他们会说这是当铺的字体。万一你要闹到县官那里，那时外管的翰林公便起了作用，县官的私囊原来是指望当铺接济的，何况对于翰林公还要卖一个面子。中班之下是一般的学徒，他们的人数和职务也有规定，主要是跑后楼，爬衣架，因此每人都练得猴子一样的本领，最末的一位专管饲养猫儿，称为拌猫儿鱼的。这样的工作可不能看轻，一则当铺里全靠猫儿灭鼠，二则那批大肚皮的、一口徽腔的朋友们，哪一位不是从拌猫儿鱼起家的？

当铺工作有一定的制度，只要没有特大的纰漏，一进典当，终身生活便有了保障。但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少年进入了那死气沉沉的窟窿，准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气，成为徽帮或扬镇帮的奴隶，久而久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人老是竖起大拇指，喊一声“我们东家”。我的叔伯兄弟本君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在小纪当铺里从拌猫儿鱼饭起，一直搞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总共积蓄了一两万现金。本二哥本来不甚聪明，在当铺里和社会隔绝了三四十年，越发变得半呆半痴。当铺就是这样地剥削人民，同时也摧残雇员。

由于大哥业务熟练，不久又找到了职业。他到郭恒兴布店去